



思高聖經學會與中國文化

李士漁

自思高成立以來，我忝為一位成員，四十六年與思高同居共處，息息相關，現在要我來談論這一問題，自然難免主觀立論。今不自量，也不自愧，和盤托出，以就正於讀者就事實立論的客觀指正。

首先，思高聖經學會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全部成員都是生於長於中國文化的中國男兒，即使為思高創立人雷永明神父(P. Gabriel Maria Allegra O.F.M.)，雖生於意大利，卻一心一意願以中國文化來使自己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為中國文化所迷的中國人。其餘幾位在思高長期工作的外籍神父也一如雷神父，是些夠分量的中國文化迷。但雷神父既是思高的創立人和中堅分子，我就以他在中國一生的

表現，來概括思高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若沒有雷神父，實在就沒有思高。他實是天主特別選派來，為使我們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由自己由聖經原文譯釋的，全部舊新約聖經的一位傳教士；不但有，而且是部合乎時代需要的聖經譯釋本。這一工作本身就是劃時代的工作，完成了天主教會自傳入我中國以來尚未完成的工作。

雷神父在死前半年奉命自撰，立意專論思高始末的回憶錄。他不但回應天主的召選創立了思高聖經學會來譯釋全部聖經，而且對聖經今後的工作擬定了一個長遠的計劃。他的理想，或更好如他常愛說的「他的夢想」，是不只要思高的譯釋工作使聖

經與中國文化掛鈞，而且要使聖經與中國文化連根並生；一同成長，一同發展。我的這篇文章就在於盡我所能說明這一點。

首先要申明一點，筆者依據的是回憶錄以外的外傳，即雷神父與學會同事合作幾十年間，間或言及的他的軼事或抱負。他在羅馬度過的五年，即自二六年秋至三一年夏，誠如他自己在回憶錄中所說，是他一生中最有決定性而又最甜蜜的幾年，其中又以居中的二八年最爲重要。在這年上由於方濟會在羅馬慶祝會內真福若望孟高維諾(B. Joannes de Monte Corvino)北京首任總主教逝世六百周年，舉行慶祝紀念會，有演講有展覽，他都參加了，使他初次與中國文化接觸，是他所謂初次強有力的觸電。

第二次強有力的觸電，是他於三十年秋與在台復校輔大首任文學院院長，死於一九八三年的高思謙神父在羅馬相遇，當時在安大就讀的惟一中國男兒，他對他是個對中國文化的發電站。有了他如獲至寶，立即成爲至交，由他口中得知有關中文聖經

在中國的近狀：基督教於百多年以前就已出版了全部聖經譯本，繼而有各種版本問世，而且現在還有一些方言譯本。他便自謂：「既然分離的弟兄已經做到的事，爲什麼天主教徒不能做到？像這樣的工作，對信賴『上智之座』的天主教徒而言，理應更容易得多。」足見從起初他就深深信賴「上智之座」無玷童貞聖母的助佑，他不難完成他譯釋全部中文聖經的慾望；在回憶錄中就明說：「在我要動身到中國去之前兩年多，我已經下定決心，我到，或更好說，我要到中國去翻譯聖經。」自那以後，他的一切全都是爲中國去翻譯聖經。

他所謂到中國去以前兩年多，即二八年底，這一年底，他自謂已將安大爲就讀修士專設的小圖書全部唸完。他的閱讀能力真叫人驚奇，聖經學會圖書館的書是他自備購置的，也可說全部讀過。他對於文字語言的造就實在淵博，大有助於他研究譯釋聖經，別的我說只就中文而言，自他下定決心到中國去譯釋聖經，就要求自己務必要精通中文，

以他最心愛的高神父作他的啓蒙導師，假日伴他出外參觀古蹟、教堂，以及各式各樣的博物館。離安大不遠拉特朗宮就有個傳教區的博物館，其中最大最爲人注意的是中國文物博物館，雷神父常請高神父同去，與其說參觀倒不如說研究中國文化。高神父當然樂意。

一日來到明朝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在西安府城附近掘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展覽處，見到全碑的拓文黑體白字懸立在一面壁旁。雷神父便問：「這是什麼東西？」高神父喜形於色，盡情就己所知向他解釋。雷神父一見高神父這樣熱愛自己祖國的文化，就乘機打趣說：「若翰弟兄，全世界哪裡找得出這樣難看的文字！」「嘉俾弟兄，你不認識，你就不能作出這樣的批評！」「我不批評，只說看，你說好不好看？」「嘉俾弟兄，你後來一定會愛的！中國文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玄妙無窮，形、聲、義，三者俱存在文字內。我們中國人實在可說一生不外乎是在學習認識，學習實用中

國字。」「難怪，那麼難看！」高神父一聽有點不耐煩，便悻悻然對雷神父說：「嘉俾弟兄，你一定會愛看的！」雷神父用手掩口笑出聲說：「巴不得！」於是高神父幡然大悟，報以微笑；雷神父與他四眼相對，也默默報以甜蜜燦爛的微笑。這實在可視爲二十世紀方濟子弟間的一件「超人軼事」。雷神父算是上了中國文字學第一課。從此以後，他便立意要窮究中國文字的玄妙，好去譯釋聖經的微妙。

當時他尚在羅馬，設法盡快學習聖經語言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至於屬拉丁語系的西方語言，如法文班文葡文，爲擅長拉丁文的意大利人根本不算是一件難事；英文德文他也盡力學習。至於中文，在三年一年赴中國的途中就設法買了一些外籍人士，關於中國文字、文化、歷史、宗教、哲學撰寫的書籍，而且也買了一本基督教出版的中文聖經。來中國以後立即自動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由小學一年級起步，受人指點得識門徑後，就從小學文字學入手，以許慎「說文解字」爲課本，自製一本尺半長七寸寬的

筆記簿，一字一字注出形聲義。然後閱讀詩經尚書史記楚詞和一些子集。最佩服司馬遷和屈原，以司氏爲史祖，以屈氏爲文祖，肯定二人對中國文字文化的貢獻，誠可與日月爭光。

他原是個富有文學天才的人，精通希臘拉丁古典文學，常隨身攜帶易利亞得(Iliad)、伊泥易德(Aeneid)和神曲，尤其但丁的神曲他幾乎可隨時隨地引用其中沁入心脾的金句和片段。自從讀楚詞識得離騷以後就嘆爲觀止，悉心研讀古今關於離騷的注釋，在他的好友小修院國文教師前清秀才江渚先生協助下，三八年在上海出版了他譯爲意大利韻文的離騷，作爲譯釋聖經的試金石。隨後以同樣地譯釋了天問、九章、九歌，發表在一些意大利雜誌上。諸子中他最愛最佩服的是墨子，以他是個天生的基督徒，印証了德都良(Tertullianus)所說「人靈生來是基督徒」的話；重視淮南子，認爲其中頗多可供聖經稽考的資料。至於宋學由於篇幅起見，更好從略。總之，他閱讀中國經書典籍既精且博，實在令

人讚嘆，誠可說他識得中國文化的源流和演變。

來到中國以後，既然要譯釋聖經就必須有譯釋聖經的經驗，這一點他自知應向與我們分離的弟兄基督教徒學者學習，研究他們百餘年來譯釋聖經的過程，對聖經出版的著作或譯作；參觀他們設立的經學院、出版社；以拉丁文撰文在當時天主教「教育叢刊」上，發表他閱讀過書刊的書評，自己試譯聖經的經驗。他都知道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和譯經的過程，常就地與主持寺院的方丈，共同研討佛經。他能與方丈打交道，就因爲他曾看了不少西方人士關於佛教的著作，自己也曾讀了一些較重要的關於密宗及淨土宗的經典。至於道教他無心細學，從來不見他結識過一位道士。不過他對於老子所著的道德經也有相當的研究。以上是他在衡陽自三一年到三八年八年期間，研究中國文化對譯釋中文聖經作出的準備。

三九年五月回國養病，在家鄉休息幾個月後，體力一恢復，就於同年十月上羅馬在聖經學院報名

補修聖經至四零年四月，後去聖地考察，兩月後返回羅馬；同年六月意國已宣戰，遂切求天主賜他能力及早返回中國。十一月一天晚上由羅馬經馬德里飛抵里斯本，四一年二月十四日乘船至美國紐約，後由舊金山乘船繞日本於四一年復活節前抵達上海，稍作逗留，遂乘坐火車北上，四月底抵達我國文化故都北平。一到北平就繼續他在衡陽於三五年四月十一日聖母痛苦節開始依原文翻譯聖經的工作；一面翻譯，一面增進自己對中文文化的知識；特請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學究顏先生給他教授中國古代經典文學，以史記和十三經，尤其其中的尚書和詩經作課本。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任職的新學究畢樹棠先生成了他的至交，藉他結識了其時留居在故都的一些大學教授和作家，比較熟悉的有俞平伯、朱自清、馮友蘭等人。也不放棄近代現代的文學，古史辨每卷必讀，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他也曾細細研讀過；現代出名的作家，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一一都不放過；務必力

求認清時代文學的趨勢，以及時代學者治史治學的原則和態度；務必使自己不只是與中國文化文學相接觸，而且使自己再三沈浸在中國文學文化中，使自己將來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譯釋聖經的工作，必是中國文學文化在自身內浸淫的流露。在衡陽八年，三一年到三八年，給自己將來的譯經工作作出了準備，在北平八年，四一年至四八年打下了基礎；於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譯完了舊約，四五年八月二日就成立了聖經學會。

由於他有十年自譯中文聖經的經驗，深知譯釋全部中文聖經決不是他獨自個人所能勝任的事，必須成立一學社來與他合作，關於這一點他已預先見到，作出了及時的準備。這一方面的經驗他求之於他最景仰，死於三八年三月十日，於一八九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創立耶京聖經學院道明會拉岡熱神父 (P. Marie Joseph Lagrange O.P.)。他在羅馬那幾年尚是個微不足道的青年學子，無法亦無緣與他結識，也未曾見過他和聽他講學，只知道他千辛

萬苦，排除萬難建立了他的聖經學院。四零年四月五日他由羅馬到聖地游學，常去學院與拉神父舊日的老同事而又同會的神父攀談，由這些老神父口中詳知拉神父一生的爲人，以及他求學的方法、治學的原則和態度，準備自己將來駕馭自己的學社，造就自己的社員。當時他住在方濟會爲造就自己子弟在耶京設立的「聖經學會」(Studium Biblicum)的會院內，很認識賞識這一機構的組織和目的，就願自己的學社名正言順名爲「聖經學會」，是「學聖經的學者會」，而不是「聖經學的學者會」；是「爲學識聖經而爲譯釋聖經的學會」，而不是「聖經學者造就聖經學者的學院」。誠如他自己對自己的同事說：

「我們是一同在學習認識聖經和中國文化文學，將聖經的原來服裝換上中國服裝。聖經是原來的聖經，服裝卻是中國服裝。」

爲了達成這一目的，他爲學會設立一個完備的聖經學、中國文學的圖書館，不缺任何古今中外基

本重要的工具書。至於會員，爲使中國的天主教會盡快有自己的全部中文聖經，力求會員全是屬於方濟會的司鐸，取長於生活習慣相同，易於過團體生活；擅長聖經語言拉丁文，不難學習希臘文希伯來文以及西方語言；晉鐸前已讀了四年聖經，不缺乏基本知識；中文有大專程度，日後可自己繼續進修；學會一成立就可正式學習其餘兩種聖經語言，以及其他關於聖經必具的學術知識，如啓示默感論、聖經訓話學、版本學、演進史等等；修改他的譯文、撰寫的引言導論註解；一、二年以後會員在他指導之下可自譯自撰，依照計劃陸續出版學會的譯釋著作。

學會成立後第二年即四六年出版了聖詠集，隨後每年一部，最後一部先知書下冊費時兩年，至五四年不到十年出版了舊約譯釋本，共八本單行本。五七年至六一年出版了新約譯釋本，共二本單行本。舊新約譯釋本共十一本單行本；先來一個五年計劃，於六八年出版了由十一本單行本修訂而成的，舊新

約譯釋本合訂本單行本；再來一個五年計劃，於七五年出版了學會編修的聖經辭典，以便於讀者閱讀學會譯釋的中文聖經譯釋本。學會於三十年內使我們出生的祖國的天主教會，有了由我們祖國文化出生的全部舊新約聖經譯釋本，對於天主教會由聖經而形成的幾千年的文化，以及我們祖國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都作出了一點一滴不可滅的貢獻。這一點一滴的貢獻就學會成立的目的和工作而言，是在於求聖經的根與我國文化的根，使兩者之間的根相連，而生出由兩者根連根而形成的本地文化。現代人一聽見「保守」就皺眉厭煩，殊不知根與本是非保守不可，如果絕根忘本根本就什麼都不復存在，還有什麼前途或文化可言！

人類的生活以及由人類生活而來的歷史和文化都不缺天主的參與，有天主的成分。出於人的成分是「人文文化」，出於天主的成分便是「天文文化」，天文文化是由於天主的啓示。天主對天下萬民都有所啓示，但由於天主特選了，或更好說特造就了

一個民族來作為自己的民族，使這民族的一切文物制度都是出於天主的啓示，都是依照天主的啓示。這一民族的文化歷史是天文文化的人文文化歷史，舊約經典記錄的即是這一文化的演進史。由這演進史我們得悉天主出於自己上智的措施，是藉自己特選特造的民族來啓示自己給全人類各民族，使全人類各民族都成為自己的民族，為此，使全人類各民族的文化史都與自己民族的文化史相連相接。時期一滿，天主還派遣他的子來使全人類的文化成為他自己本位的文化。

天主子降來人世，在世建立了教會，藉教會宣講他的福音，使當時繼承人類文化大統的希臘拉丁文化，受福音的洗禮，也成了福音化的文化。教會的演進就是這一文化的演進，新約經典、福音以及宣講福音的宗徒經書，即是記錄這一文化的出生和演進的文獻。新約經典是出於宗徒時代，譯釋闡揚新約經典，以及由之而來的舊約經典，使當時集全人類文化大成的希臘羅馬文化福音化的，是日後繼

續宗徒時代而來的希臘和拉丁教父，是他們以自己的著作使人類文化與由聖經而來的天主本位文化連根相接，爲此，教父學爲研讀從事聖經工作的人是必修的科目，竟委窮源必讀的根本文獻，尤其是教父聖奧斯定的著作。

學會成立後，雷神父初次回國就爲學會備辦了全套希臘拉丁教父學，注釋經籍時常指點會員應參照引証哪位教父的哪種著作，聖奧斯定所著「天主之城」(De Civitate Dei)是會員必讀的教父作品。吳應楓神父早在上海出版了他的譯本、吳宗文神父後又在台灣由商務出版了他的譯本，讀者讀了就知道這本書的價值是在於以由聖經而來的天文文化爲經，以由人類而來的人文文化爲緯，闡明兩者之間直接間接的關係，使人明瞭人類整個文化的淵源、本質，以及它的演進史。聖奧斯定是就自己當時的文化立論，後世大思想家如但丁、帕斯噶(Pascal)、曼蘇尼(Manzoni)以及近代的紐曼(Newman)，對自己的時代人類文化在自己的著作內，也發揮了與聖

奧斯定相同的思想。一生研讀聖經，熟悉上述作者著作的雷神父自然也作如是觀。

但有一點卻是他所獨具的，是他沉浸在中國文化中對中國文化透骨的認識。關於這一點聖奧斯定可說全無，其餘幾位不說他們一知半解，至少不能像雷神父一樣是切身的知識。由於他研究聖經很重視人類文化的淵源演進和演變，波斯希臘羅馬三帝國一脈相承的政治與文化，固然包括歐亞非三洲，但由於希臘羅馬兩帝國屬於歐洲，即所謂的西方，初興教會所要福音化的自然是西方文化。由於教會承繼的福音化的是西方文化，教會福音的文化生活自然富有西方文化色彩，教會拓展至全世界，全世界人類對西方文化就有所接觸有所認識；但聖經內的人文文化並非不包括東方文化，波斯帝國以往的帝國都是建立在亞洲即所謂的東方，但只包括近東並不涉及遠東。教會藉宣講福音使全部西方文化福音化，也要藉宣講福音使全部東方文化福音化；天主並沒有放棄，更不是不重視東方文化，而是有一

定的步驟和時期的。

就文化而言，代表東方文化的是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尤其中國文化。全世界古老文化循序演進保全至今，完好如初，範圍和影響所及如此廣泛而又如此悠久的，誠可說是只有中國文化。雷神父謂他初次與中國文化接觸有如觸電，從起初他就覺得中國文化與聖經一接觸就發生電流。這一感受在他到了中國沉浸在中國文化中使他更感到神秘神妙。憑他研究聖經的頭腦和心靈，斷定天主至今保存中國文化完好如初是有他的目的的。一提筆寫他的回憶錄就說：的確，無玷之母——他所信賴得以完成他譯釋中文聖經志願的「上智之座」，如此行事，就因為她愛這樣熱愛她的「息寧子民」。他譯釋聖經越譯越相信，依四九：十二言及的「息寧」是指中華民族。教會以宣講福音電鍍了西方文化，使之成為福音化的文化，也要以宣講福音電鍍東方文化，使之成為福音化的文化，這是他所以死心塌地務必必要自己識透或「濕透」中國文化文學的玄妙，

去譯釋聖經的微妙理由。為此，學會一遷來香港就乘機購買了全套四部叢刊和二十四史。

的確，如要認識中國文化唐宋以前的文獻，尤其漢唐兩朝通西域的文獻是非閱讀參考不可的。在譯釋聖經期間，雷神父常對自己的同事說：在某書某處似乎有與聖經相同之處；或閱讀同事譯文，如覺得未有或未全表出原文的原意，就要同事另擇適當的字眼或文句修改譯文，肯定這就中文而言並非是件難事。七三年春因病回國休養，七四年八月三十日再回到學會，其時辭典已快要印到一半，一查閱就立即提議應附加七附篇，其中兩篇未能請到人，或請到人而遭婉拒，遂自告奮勇於短期內，寫了其中最後兩篇附篇，由此可見他的用意，是要中國讀聖經的人不要忘了自己祖國保全至今古老的燦爛文化。同時，力求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有了學會出版的聖經譯作或著作後，進行譯釋教父學，以恢弘我祖國的文化，以及全世界的文化。

他常對自己的同事說：若在百餘年以前，甚或

在六、七百年以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就有了自己全部譯釋的舊新約聖經，那中國就不是現在的中國。她對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對全世界人類的文化的貢獻，決不是人可以想像得到的。他酷愛中國文化就願中華民族知道天主委諸自己文化的使命。關於這一使命，天主叫他到中國來尚只完成了最初最基本的一步，他年少時的夢想。由完成這一夢想而來的較年老長遠的夢想，由學會現狀看來不是他和他同事而是有待來者。回憶錄最後一章是他這個窮小子對上主的祈禱，祈求天主賜他同會的弟兄秉承教會的精神和以往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完成他的遺志。

不錯，學會成立至今尚不到五十年，舊新約合訂本尚只有二十三年，在國內國外中華民族形成的天主教會內，興起了讀經熱、研經熱；到處成立的聖經小組、聖經協會，以及最近在香港成立的聖經學院，都使人由於深切認識聖經，更認識基督以及由他而來的信仰和教會，在世過認識天主和永生生

活。這一生活是必誠於中而形於外的，所以，信友都以自己的聖經知識來設教，來傳教，來培育發展自己的以及他人的信仰生活，不但充實了自己內部的禮儀聖事生活，而且與外人接觸也使他們沾染了我們的生活思想和習氣，口頭筆端，常採用我們教會的口語術語，常引証我們教會的聖經譯文和著作。更可喜的是教會內的壯年男女學者不少已進軍教父學，以教父的著作來發揚我國的聖經學神學哲學，作教父對西方文化所作的事。誠然，天主不能不求自己的光榮，他口中發出的言語，不能空空地回到他那裡去，必實行他的旨意，完成他派遣他的使命（依五五：十一。參見若八：五十；十二：廿七及廿八；十七：四十五）。為此，天主聖言降來人世，總結他的福音親口說：「天地要過去，但我的話決不會過去。」（瑪二四：卅五；谷一三：卅一；路廿一：卅三。參見依四十：六至八）誰能對天主子聖言親口說出的這句話，唱反調？